

防盗门上的窥视镜,无疑开启了一个偷窥的时代。这就是现代城市人的尴尬,在防贼的同时却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窥视镜下。温暖被铁窗隔断,眼在铁窗中惊慌。

铁窗外的城市

蒋子龙

没有门窗的房屋是坟墓。城市里的建筑都必须有门窗。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市的门窗成了城市的弱点、漏洞和威胁,让城里人提心吊胆,白天不敢大意,夜晚睡不安稳。

自有城市的那一天就有小偷,为什么于今为烈?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偷儿们的伎俩也现代起来,他们通过门窗潜入他人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出入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天,甚至谋财害命。万般无奈,自由的都市人从监狱得到启发,用钢铁将家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钢板做成防盗门,铁棍做成铁窗。

“铁窗”——泛指监狱。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监狱,除去没有自由。如果把自己的家装备得在外人看来像监狱,偷儿们也就不敢轻易光顾,即使他们有那种贼胆,也未必有冲破钢铁防护的贼招儿。这下,城里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每个住宅小区

几乎都有自己的院墙,门口有栏杆、警卫,对出入人等进行盘查。人们进入每一栋楼房,必须先要打开通向楼道口的第一道大铁门,楼门洞有多宽多高,铁门就要有多宽多大,壁垒森严,厚重安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紧锁着,而且是现代牢靠的电子密码锁,开启的方法各式各样,有的用遥控器,

有的用大钥匙,有的须站在大铁门外面对着扬声器第二道小一点的铁门,进入的程序和进入第一道大铁门差不多,所以现代城里人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出入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天,甚至谋财害命。万般无奈,自由的都市人从监狱得到启发,用钢铁将家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钢板做成防盗门,铁棍做成铁窗。

“铁窗”——泛指监狱。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监狱,除去没有自由。如果把自己的家装备得在外人看来像监狱,偷儿们也就不敢轻易光顾,即使他们有那种贼胆,也未必有冲破钢铁防护的贼招儿。这下,城里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每个住宅小区

几乎都有自己的院墙,门口有栏杆、警卫,对出入人等进行盘查。人们进入每一栋楼房,必须先要打开通向楼道口的第一道大铁门,楼门洞有多宽多高,铁门就要有多宽多大,壁垒森严,厚重安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紧锁着,而且是现代牢靠的电子密码锁,开启的方法各式各样,有的用遥控器,

有的用大钥匙,有的须站在大铁门外面对着扬声器第二道小一点的铁门,进入的程序和进入第一道大铁门差不多,所以现代城里人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出入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天,甚至谋财害命。万般无奈,自由的都市人从监狱得到启发,用钢铁将家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钢板做成防盗门,铁棍做成铁窗。

置于偷偷摸摸的境地。正是这防盗门上的窥视镜,无疑开启了一个偷窥的时代。被关在铁窗里面的城市人,想借助望远镜延伸自己的眼睛,更多地获得看的自由,看到铁窗外更多的景观,尤其是别的楼里的铁窗后面的情景。这就是现代城市人的尴尬,在防贼的同时却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窥视镜下。温暖被铁窗隔断,眼在铁窗中惊慌。城里人就是依赖这种被关在铁窗内的一种不自在和不舒服,获得了一种被囚禁起来的安全感。或者说自身和财产相对安全了一些,但心理上却不那么安全了,所以现代人的精神疾苦格外多,抑郁症、变态狂……各种稀奇古怪的病症令人匪夷所思。

看上去非常牢固的铁窗,反而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脆弱。于是他们就越发离不开铁窗,依赖丧失去自由的铁窗,来获得一种虚

妄的安全保证,甚至借铁窗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将其视为财势的象征。现在的城市建筑里都是一道道铁门外加一扇扇铁窗,如果说进楼的第一道大铁门是防外面的强盗,那么楼内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就是防楼内的坏人?楼内住的都是邻居,难道要以邻为盗,各自为战?

富裕起来的现代人,成天防备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心里又怎会不紧张,不孤独?人人心里像有一座监狱,人人心里像有一座监狱,但是,监狱被从外面攻破的时候不多,倒是监狱里边闹事的不少。祸起萧墙,监守自盗,家庭解体,争抢财产……可惜,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现代人却还没有发明一种能够“防心”的铁门和铁窗——借以防住贼心、花心、妒忌之心、狡诈之心、怨恨之心、歹毒之心……

摘自《人民论坛》

啊。”年轻人激动地说。

富翁顿了顿,缓缓地说道:“后来,我岳父去世,给我留下数以亿计的遗产。”“您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年轻人困惑地望着富翁。“什么也说明不了。”富翁拍拍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说,“年轻人哪,记住,成功的因由和失败的因由一样,多得无法想象。”

摘自《深圳青年》

有多少人成功因由

布,把苹果擦得清亮亮,然后,将它们卖了200美元。第二天,我又用这买了400美元,就这样反复了一段时间,直到我手里有了100万美元……”

“哦,后来您就这样开始了您成功的商业生涯

走,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与生活。离家出走的多拉最初在柏林的一个犹太孤儿院当裁缝,后来到一个海边的度假村里做厨房里的帮佣。

许多时候,命运总是喜欢随心所欲地伸出手来,将悲剧的种子埋下,然后,悄悄地閃在一边,一脸讪笑地等待其开花结果。19岁的多拉,遇到了她的爱情——弗茨茨·卡夫卡。一个被誉为20世纪的天才文学大师的犹太裔捷克人。那样的一场相遇,想来有着几分戏剧的味道。那一年,卡夫卡和他的妹妹以及妹妹的两个孩子到波罗的海度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度假村。一天,卡夫卡路过度假村的厨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在杀鱼,卡夫卡不由得感叹道:“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啊,可干的活又是多么的残忍啊!”那个杀鱼的姑娘便是多拉。卡夫卡的话让多拉羞愧难当,她当即向度假村的负责人要求换个活干。就这样,他们相识了。那个男人深邃的思想、幽默的谈吐以及隐藏在那些表象背后的令人心碎的忧虑与绝望,深深地触动了多拉,同时多拉身上那种坚毅与执着以及青春的勃勃生机,也深深地感染了卡夫卡。他们相爱了,多拉的出现唤起了卡夫卡被压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爱情的力量

使这个已经对自己的生命自暴自弃的男人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欲望。他开始像个孩子般俯首帖耳地听从多拉的话,认真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后来,他们在柏林租了房子,开始同居。在多拉的身边,卡夫卡的每一天都沉浸在无限美好的遐想中。与多拉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卡夫卡得到了他从未拥有的温暖与爱。多拉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读《叶塞尼亚》,阳光下,这两个“文学的寄生儿”,在广袤的犹太文明的草原上,尽情地享受着爱情与文学的激情相互撞击所带来的飞扬际的快乐。

在布拉格人的头脑中,“卡夫卡”这三个字,是“瞬间密集的生活”的意思。或许,冥冥中也昭示着,他们的爱情,不过是生命中一段轮转着不期而遇的幸福瞬间,然后,在某一时刻,这一幸福戛然而止,用“卡夫卡”的方式留给生命一幅冗长的寂寞画卷。

1924年春天,一个熏风草暖的日子里,医生告诉卡夫卡,他的病有了缓解的趋势,卡夫卡高兴地哭了,他紧紧地拥抱了多拉,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康复,渴望着活下去。卡夫卡向多拉求婚,征得多拉的同意后,卡夫卡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他答应把女儿嫁给自己。在信里,卡夫卡称自己为一个回头浪子,“一个悔过的人”。

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德兰修女。在颁奖仪式上,德兰修女说:“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那个人或这个人。总之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人类。”

摘自《当代青年》

爱具体的人

没有回答官员,而是惊奇地问道:“数以百万?你怎么数出一百万的?”官员不耐烦地回答道:“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意思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是数不完的,穷人太多了,你明白吗?”德兰修女笑了笑,还是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hwb1616@sina.com

死神面前的爱情舞蹈

那样的相遇,注定是一场于死神面前的爱情舞蹈。遇到那个男人时,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病痛的折磨,使这个39岁、正值壮年、身高1.82米的大男人只剩下不足55公斤。他天天咯血,并且对未来绝望,拒绝治疗。

然而,她依旧爱了。许多时候,爱上一个人,就必须承受他命运的碎片。虽然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可以握在手里的温暖,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她痛苦难终是无法触底。她赌上了一生最真的痴心,换来的却是一段真挚、狂热却极为短暂的幸福时光。

十一个月,是那场爱情的所有时间,是那个男人留在世上的最后光阴。

她叫多拉·迪阿曼特,是个犹太姑娘,有着一双纤细的手,一头乌黑的长发,一颗善良的心。她勇敢坚毅,心思细密,温柔而又多情。

年轻的 多拉原本出生在一个富足、极富名望的犹太家庭里。如果不是个性使然,她像她的姐妹们一样,由父母包办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然后,在锅碗瓢盆的平淡中,日复一日地翻版昨天的一切。然而倔强的多拉不喜欢父母保守、教条的生活方式,她不想在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身边度过自己的一生,不想将自己一生的幸福拱手交给父母去安排。她依然离家出

著名的德兰修女,是印度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德兰修女建立临终关怀院的初期,曾有位官员专门质疑德兰修女的行为。

官员问:“你这么 做,难道是为了让贫民窟更适应人居生活吗?”德兰修女回答道:“不,是让死者死得更 有尊严。”官员又问:“你打算帮助加尔各答数以百万的贫病伤残吗?”德兰修女

犹太人”“一个渴望赎回自己的人”。然而,多拉的父亲却本着自己的反感和正统犹太教的精神,拒绝了卡夫卡的求婚。

病痛中的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亲的回信,只是苦笑,一言不发。夏日的第一朵玫瑰尚未来得及开放,便在这突然而至的凄风苦雨的摧残下过早地凋零。卡夫卡明白,自己一生都无法享受具有赎回意义的婚礼了。自己终将成为一个毕生的单身汉凄凉地死去。那个夜晚,支撑着无比痛苦的身心看完《饥饿的艺术家》的清样后,卡夫卡,这个一生活格怪异、从不将喜怒哀乐写在脸上的男人,终于忍不住,长时间的泪如雨下。

与卡夫卡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多拉,她无比激动地渴望着与爱人步入婚姻殿堂,然而等待她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不被承认的婚姻,多拉甚至无权参加爱人的葬礼。然而,她还是来了,她固执而决绝地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责难与嘲讽的目光里,哭得死去活来。

整个葬礼上,多拉那唯一的号哭声极具戏剧性地昭示着卡夫卡的一生:这个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的温暖过他。在多拉撕心裂肺的哭声里,曾经的一切苦难与伤痛都随风飘逝,只有那一段春花般瑰丽的爱情,在尘世间永远不曾凋零。

摘自《意林原创版》

了。”

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德兰修女。在颁奖仪式上,德兰修女说:“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那个人或这个人。总之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人类。”

摘自《当代青年》

英国伦敦的一家私立中学里,有一尊雕像。这尊雕像颠覆了人们的传统审美视觉和思维习惯,以独特的造型吸引着广大观众。由于对教学课题的研究,我走访过几十家学校,它们的雕像或飞扬,或跨越,多象征着探索和进取。而伦敦这家私立中学的雕像,却是一尊倾

海瑞恩困局

44岁的段建生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刚从报上读到消息:“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到610万,加上2007年~2008年约有250万人没找到工作,估计2009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为860万人。”但作为急需人才的德国海瑞恩精密技术公司总经理,他还是招不到合适的大学毕业生。从2004年开始,他们公司就在中国招兵买马。那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是239.1万,但公司只在上海和北京招了7名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公司把他们送到公司总部——巴登符腾堡南部的小镇进行第二轮面试,在两周内彼此沟通,最后与6个人签约,如今坚持下来的则只有3人。这样的尴尬海瑞恩每年都会遇到,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应届毕业生,另一方面却是找不到、留不住人才。“2006年我们招了两名清华学生,当他们得知将在江苏太仓工作,就放弃了。”段建生无奈地说。其实江苏太仓离上海只有几十公里,但许多毕业生只愿意在特大城市工作。海瑞恩的条件很诱人。这家专业生产汽车发动机精密配件的德国公司,经过40多年努力,已成为德国博世集团、宝马和奔驰汽车的供应商。2008年,拥有1400多名员工的海瑞恩创造了1.55亿欧元的产值。

“说实话,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都集中在上海,我们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德国总部培训几年。”段建生说。招来的新员工在德国总部受训期间,海瑞恩包吃住,每月提供800欧元工资,除了德国法定假期外,每年还有10天带薪假期。公司还会

从毕业到就业

4月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和芝罘研究院主办的“从毕业到就业”学术研讨会上,段建生再次表达了招不到合适员工员的尴尬。上海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徐忠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不少企业其实招不到人,而上海的大学生就业很多连北京、广州都不愿去,只想在这里谋求发展。每年三四月份,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约高峰期。但

换一种坐标生活

于丹

的,你只能以一种谦卑之心等着它们,静静地侧道而过。在北京堵车的时候,二环路、三环路,跟停车场似的,有人一按喇叭,骂骂咧咧的,还站起来指着前面骂。那个时候我们很紧张、很猖狂,我们觉得被人占用了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团队,都在一个繁忙的城市讨生活,谁被耽误一点时间火气就大得很。但是,在一片安静的草原上,像呼伦贝尔草原,为什么你面对牛羊会宁静下来?因为你换了一种坐标,你是以牛羊的方式在自然里面完成一种唤醒。

我觉得,在一些改变了坐标的地方,我们的判断方式是会变的。有一次在云南丽江,那天晚上我们在四方街上逛小店,之后着急去看音乐会。当时陪我的是丽江电视台的台长,这个小伙子习惯于都市的紧张节奏,我们走着走着,忽然前面有三个胖胖的纳西族老太太,把路堵死了,她们胖胖,走得特慢,她们三个人晃过来、晃过去,我们怎么借道都过不去。小伙子就过去和她们用纳西语打了几句招呼,意思还是借个道,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胖胖的老太太笑笑回过头来,说了一声笑,然后小伙子说“啊”了一声,站在那儿,老太太就接着走了。

他说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她说,小伙子,咱们所有人从生下来就住同一个地方走,早去也是去,晚去也是去,既然都是去,干吗不慢慢走走。今天我们都在说文化,像北京这种首都,包括我们的广州、上海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达到国内顶尖的大都市,但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唯一的坐标是狭隘的、社会的。其实你以这种本初、原始的文化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好像都习惯于在使用价值上被判定。但是换一种坐标呢?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向牛羊学习还是像仙女一样静默地给自己一小时,其实都是在转换生命坐标里面给自己一种生命保鲜的理由。

摘自《时文博览》

自己和潘赞化照片的鸡心项链,风尘仆仆地回国。他将部分遗物交给了潘家后人,其余的捐赠给祖国。她殉国中华,奉献国人的夙愿,得以实现。

做完这一切,他自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身体忽然就垮下来,一经检查,居然是癌症晚期。那么多年,他居然对自己的病痛一无所知。或许,是他不敢生病,就连身体都帮他撒了谎,因为他若是倒下了,谁来照顾那个只会画画不会生活的女人?他若是倒下了,谁来帮她完成一生的夙愿?

他去世后,家人将他与潘玉良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在潘玉良的一生中,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享誉中外的画家,知道有个将她从青楼里拯救出来,让她脱胎换骨的潘赞化,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陪她度过风烛残年的男人。他叫王守义。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爱,在潘玉良的传记里向来都被一笔带过。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爱她,从来就没有求过回报。

摘自《女士》

谁推倒了你

刘东伟

倒的巨人。雕像的基座是大理石的,通体青黑色,高有五六米,上面的巨人一只脚连着基座,另一只脚踏空,身体朝前下方倾着,与地面呈四十五度角。

回到国内,我在学校

举办的教研会上,进行了演说,当然,最后我也将伦敦私立中学那尊雕像说了出来。听后,校长大为动容,说,这才是最有价值的经验。

校长说,雕像虽然是跌倒的,但是,它的警示

作用是巨大的,人生的路上,谁都有可能跌倒,只有知道是怎么倒下的,才能避免再次跌倒。

那么,是谁推倒了你?如果你只顾昂头走路,肯定找不到答案。

摘自《天津日报》

就业难是个伪命题

截至今年3月,调查发现,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签约率仅三成,七成因为对岗位、薪酬不满意而未签约,甚至还有方向。如果把大学生就业难的矛头指向“招”,未免有失公允。“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只是一个人才相对过剩现象,并非高级人才需求已饱和。”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表示,中国目前的大学生数目与美国相当,相对中国五倍于美国的人口基数,当前2700万的中国大学生数目并不算多。但是,如今应届大学生的低就业率是不争的事实,校内就业指导不当也许是一个原因。上海市教委学生处处长汪敏表示,虽然98%的上海高校配备职业指导,88%的学校从大一就开始给学生提供相关咨询,但师资力量是一大问题,超过企业的老师少得可怜,很多老师一毕业就留校,而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很少回到高校任教。

学术界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提出了七条对策:第一条是“新知青政策”:让10%的毕业生到西部工作。政府也在多渠道地拓宽大学生就业的途径,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工作的毕业生,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鼓励大学生担任村官。

第二条是“薪顶替法”:父母退休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顶替空出来的名额,但不一定要继续做父母原来的工作。问题是,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因为不公开的招

聘人才而缺乏竞争力,而且可能会滋养一些垄断性企业的“世袭罔替”。

第三种方案是“学土后”:本科延长一年毕业,让大学生在“大五”时在校参加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

第四招是动员大学毕业生成到中小企业或NGO(非政府组织)就业。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就业吸纳能力有所降低。即使是仍在正常经营的中小企业,也由于预期不好,缩减了招聘新人的计划。再花1~3年给大学生进行培训,是缓解矛盾的第五条对策。1~3年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就不用了,他们何必当初不直接去念高职,而是先到大学念4年本科呢?

第六条是鼓励创业。如今应届毕业生创业门槛高,缺乏社会和心理资本。很多大学生是无法就业才创业,而创业的要求往往比普通就业要高得多。

最后一条是非正式就业,也就是所谓的“灵活性就业”。对于所谓的在今年6月仍然没有签约的往届毕业生,可以去社区服务或参加各种培训。

这七条建议都有不足之处。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军建议中国的高校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为那里的校长关注产业发展,这几年新开了飞行员、导航员和轨道交通等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是上海高校中最高的。可见,大学生就业的确很难,但并不是个无解的问题。

摘自《新民周刊》

那个无名的男子

玉良。

冷冰冰的小屋里,重新燃起了熊炉火。潘玉良的饭桌上又有了面包、黄油和咖啡。因为为他,她有了新画室,她又开始到凯旋门画室写生,举办了数次画展。正是靠着他的血汗钱,她的艺术之路得以延伸。

然而,这样的患难之交,在潘玉良心里其实是算不得爱情的。她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生活在大洋彼岸的潘赞化。最偏己的偏见不到,因为战争失去联络,一番辗转,便错过了20年的光明。直到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潘玉良才得以与国内的亲人联系,潘赞化早已离世。

悲伤之余,潘玉良重新审视那个默默陪伴了自己20年的男子。蓦然回首,她发现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包含了他的汗水,每一枚奖章都浸染了他的心血,那些相拥相守的岁月啊,分明潜藏着深深的爱。她终于决定,把自己的身心都交付于他,牵着他的手走完人生的风烛残年。他们满不

憾,等待着结束漂泊,回归故里的那一天。然而,她等不及了。1977年秋天,她抛下他走了。弥留之际,她叮嘱他,日后再回,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以及她再赴法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表,归还给潘家的后人。

潘玉良去世后,他几乎倾其所有,以10万法郎重金在蒙帕那斯公墓租下为期100年的一块墓地,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然后,他马不停蹄地去完成她的遗愿。

1978年秋天,年逾八旬的他带着潘玉良的一张自画像、七大铁箱遗物、两千多幅遗作以及她一直珍藏的印有